

時間：2011年4月16日星期六 10:00-12:00

閱讀文章：Staub, E. (2002). From healing past wounds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caring: contents and processes of peace education. In G. Salomon & B. Nevo (2002) (Eds.), *Peace education: The concept,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around the world* (pp. 73-88). N.Y., London: Psychology Press.

導讀人：詹寶菁

作者認為和平教育有數個目標，這些目標在協助發展平和的個人和創造和平的世界上都很重要，這些目標為：

- ◆ 協助發展關懷和非侵略性的兒童和成人，他們能以和平的方式在生活裡和人們產生關連。即幫助兒童和成人使其成為關心、有能力也願意促進他人的福祉。
- ◆ 協助使兒童或成人成為會採取行動的人，以防止自己所處社會或世界上有暴力發生。包括創造能抑制暴力和促進和平的結構和機構，例如和平學校 (peace schools)、能促進和平的有效與合乎人道之司法系統、一個能夠回應和協助遏止歧視和暴力的國際系統。

若要成為有效的和平教育，需要結合概念和經驗的學習。兒童在概念和經驗的學習是相互重疊，但是僅僅是概念的學習並不能達到我所提出的和平教育目標。我也強調和平教育需要從兒童開始進行，當然成人也需要和平教育，只是方式不同。在和平教育裡，兒童和成人需要發展與和平方為和承諾行動有關的情緒面向、價值和技能。雖然我們可以找到和平教育重要的普遍要素，但是他們需要適切地運用於各個特殊的情境，因此各個脈絡情境的兒童和成人需要不同的和平教育，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兒童；安哥拉曾經當過童兵的兒童；美國中西部詳和社區裡的兒童；各國的軍中成員也差異頗大，如哥倫比亞和丹麥，他們需要的和平教育是不同的。

一、和平教育的概念要素

1. 貶低他人

在和平教育中，人們需要學到：人類傾向區分「我們」和「他們」，並貶低和傷害「他們」，通常這是最常見，也是最基本和重要的暴力來源，特別是有關集體暴力。

有許多研究是針對差異化和貶異的根源，包括人類心靈傾向分類，如高/

低、多/寡、他/我；刻板印象，提供對他人的期望、簡化的關係、提供既定的方式去感覺其他團體的人和與之回應。當然，這也提供團體內的成員安全。我們可以在六個月左右的嬰兒看到此現象—依附照顧者並害怕陌生人。

整個群體如何被貶低，又如何成為文化的一部份，關於這過程的研究較少。就作者的觀點，文化貶低開始於一些點，包括對明顯差異的反應、創造新認同的需求(基督教/猶太教)、提供將他人置於較低社會地位的合理理由(黑人/奴隸)，或不合理的對待(族群成員或窮人)；當發生嚴重經濟問題時，需要代罪羔羊或意識型態上的敵人；或是持續的政治和社會混亂。

當一個團體被貶低時，有許多力量會共同作用以維持其貶低。該團體的成員會經歷歧視，文學和媒體會傳播其負面印象，兒童也會被教導去貶低他們。這個團體就成為替罪羔羊，和被選為意識型態上的敵人。當一個社會歷經嚴重的經濟、政治重組和混亂時，現存被貶低的團體往往會被指責是造成這些問題，並成為實現新希望的阻礙。

在一些團體衝突的例子中，過去貶低他人的歷史使非暴力解決衝突愈顯困難，對他人的負面觀點和不信任，使衝突棘手和導致暴力。

貶低在內容和強度上並不相同，他者可能被認為是較不聰明和懶惰/道德敗壞/剝削、傷害、摧毀我們。當貶低強度高就容易引起暴力，或是一個被貶低的群體但是有高尚的工作、優渥的物質條件、不錯的社會地位(如戰前德國的猶太人、土耳其裡的美國人、Tutsis in Rwanda、Baha'i in Iran)。

和平教育就是要顯示對於他者的負面觀點通常是貶低，而非正確的呈現他人，讓兒童能夠注意和客觀地檢視社會裡宣傳的某些群體的負面觀點，也協助學生留意自己是如何貶低他人。

總而言之，和平教育必須協助兒童學習和意識到貶低其他群體，在導致暴力上的嚴重性，必須能指出和協助兒童克服其對他人的貶低，進而推動其他人去消除貶低，這些涉及和平教育裡的概念和經驗兩個層次。

作者提出功能取向(functional approach)或許有助於矯正貶低，是從文化進化的觀點，認為每一個團體都有獨特的特徵，因此產生團體間的差別。依此觀點，當團體遇到特定的情況，團體的領導者會依該時機做出或許是偶然的判斷，而依此反應。經過了一段不同情況或反應的歷史，群間就會產生差異，如面對資源匱乏，有些原初社會的成員間會發展出分享任何事物的文化，相反地，有些就會非常自私。

兒童和成人獲得此一功能觀點，就能產生新的觀點看待其他團體和自己，除了是上帝賦予的生活方式之外，也是事件和反應歷史的結果，這可能導致對他人較多的接納。

2.破壞性 vs 和平的解決衝突的方式

3.瞭解個人和群體衝突的原因

4.導致群體衝突的影響

5.瞭解旁觀者 (understanding bystanders)

二、和平教育的經驗要素

1.實現兒童基本心理需求

這是和平教育最普遍和散播的面向，認為所有人類都有基本和共享的心理需求，如安全、正向認同、和他人正向關係、自治、效能和控制感和有意義理解世界等。

為了實現這些需求，兒童（成人亦然）需要愛和教養，他們也需要正向引導、規則和紀律。當這些需求實現了，關懷他人福祉的地基就出現了，相反地，如果兒童不斷遭受沮喪，到仇恨和侵略攻擊的地基就出現了。

2.做中學

正向引導的一個面向就是引導兒童從別人的角度來行動。如同暴力一樣，關懷和協助也是在做中學，透過他們涉入的行動中學到的。如兒童教導較年幼的兒童，為貧窮者做玩具，或幫助院童，後者是較有助益的。在納粹時期，幫助猶太人承認一開始他們的幫助是有限度的。當人們幫助他人，因為某些正向的影響，他們傾向看重他人和其福祉，並且視自己為能幫助他人的人。

3.發展交錯的關係：從貶低到包容 (inclusive) 的關懷

在發展對他人關懷時，有可能導致僅關懷自己團體裡的人，為達到有效的和平教育，關懷他人需要是包容性的 (inclusive)，理想上是擴及所有人類。

許多救援猶太人的人，都來自不會將人群截然劃分的家庭裡，他們比較會接受團體外的人並和他們有互動，如猶太人。和所屬團體以外的人密切相處，有助於減少貶低和它發展 inclusive 關懷。

和其他團體成員的連結愈深，正向的效果愈大。表面的關係，如同住一個社區鄰里，並沒有助於減少偏見；觀光，沒有和當地人真正相處，可能帶者更深的偏見回家。相反地，學校裡的合作學習過程有正向的效果，兒童在合作的過程中一起工作以完成團體作業。在此過程中，兒童可能和來自不同的團體的人一起工作，如拼圖法。對成人克服貶低他人和發展含納性 (inclusive) 關懷而言，深入投入的共同工作也是很重要的，有共同的目標，或是更高的目標，是很重要的。

以上的討論是基於接觸的假設，社會心理學家發現接觸在創造正向的態度

有不同的影響，Allport 認為若要接觸有效，一些條件必需存在：參與者的對等、支持接觸的權威等等。

在一些情況接觸的有效性是受限的，如缺乏共同的目標，在合作的過程中，有一方就不會是真正的合作，投入貢獻。

先備的情況也可能產生影響，如成員來自不同的團體，可能各自有不同的溝通模式，所以需要先互相瞭解，或透過相關訊息，以免有負面的反應產生，因而無法合作。

上述幾點說明了我們必須注意形成有效接觸的歷程，包括瞭解和同理他人；尊敬和接受，意味著需要注意公正（fairness）和公平（equality），雖然外界並不是如此；每個人依據他的能力有所貢獻。

之前提及兩個情況，支持接觸和公平的權威，並沒有在 Kelman（1990）進行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問題解決工作坊和夥伴間建立起來。在更廣的社會裡，以巴的關係是不對稱的，互相仇視，因此參與會議的人需要保密。雖然會議裡，相關當局、Kelman 和他的工作夥伴支持這項行動，或許產生了一些對等的關係，也有一些正向的關係，促使一些參與者投入和平運動中，但是這個情況並沒有在更廣的世界中產生。

4. 協助人們從受難和傷害中復原

作者在盧安達的計畫特別著重在協助人們從種族屠殺的精神傷害中治癒。如果缺乏如此的治癒，倖存者會感到脆弱，並認為這個世界是危險的，因此，他們會進行自我防禦，使自己免於威脅和危險，這些他們認為是自我防禦的行動，往往使這些人成為作惡者。

有些人雖然不像盧安達種族屠殺對人們造成的傷害，但往往也造成心理的傷害，如家庭、鄰居或其他不好的對待經驗。這些人也需要治療，透過和關懷人員的連結、在支持的情況下投入於他們的經驗。治療本身關心和專注於關懷他人的可能性，可能產生利他主義，即人們會幫助他人、為他人福祉努力、和為和平而努力，因此他人不會遭受到相似的苦難。

一個治療的途徑是回到痛苦的過去經驗，在此情況下，是協助去改變情緒的力量，和經驗的意義。通常涉及說和分享經驗，可能是對他人、治療師或其他有類似經驗小團體中的成員。或是在安全的情況下寫下痛苦的經驗，或是對錄音機在某些文化中也有治療的作用。

但是在盧安達，是屬於口語社會，寫作就比較困難，所以作者在計畫結尾，讓人思考他們在種族屠殺中的痛苦經驗，然後進入到讓他們在小團體中和其他人談。他們能夠說出非常痛苦的經驗和從別人那裡接受到關懷支持。

5. 道德勇氣和建設性的忠誠

讓兒童參與重要事情的決定，有助於發展其道德勇氣。指的是，當遇到反

對意見時，兒童有能力也有意願為支持某些重要價值來發聲和行動，特別是有關他人的福祉與和平。如果缺乏道德勇氣，容易成為被動的旁觀者。

人們和他們所屬團體關係的本質是不盡相同的，例如盲目的愛國者毫不批判地接受和支持他們國家所做的任何事情，他們不懷疑，他們和建設性的愛國者相較之下，獲得的訊息較少。相對地，建設性的愛國者，覺得因為他們愛國，所以當國家作為有違於重要價值或傳統時，他們有義務改善國家。因此，指出人們和所屬團體的關係是重要的，是參與破壞過程、被動地旁觀、或是阻止破壞。

6. 效率感和有原則的行動

許多人不知道如何為和平而行動，即使他們深切關心和非常想要促進世界和平，因此，和平教育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即在協助人們學習如何去發現或創造促進和平的途徑。有效的行動需要與他人結合，共同發聲較個人容易為世人所注意。

創造和平是緩慢和困難的歷程，很容易就覺的沮喪氣餒，所以如果能發展為某些原則而行動的承諾，即使沒有立即的結果，人們也能持續為這些原則（或理念）而行動。另外，當人們相信他們能有效率時，通常比較有行動的動機，當改變緩慢時也能持續地行動。所以增強個人的效能感和有原則的投入是和平教育重要的目標。

省思：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和平教育？